

第一章 排满风起

● 洋人的朝廷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特别是 1901 年（光绪二十六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已在中国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方面，完全处于控制地位。此时，大清帝国呈现出一幅惨不忍睹、血迹斑斑的图景。

领土方面：英国霸占着香港岛、九龙，葡萄牙占据澳门，沙俄侵吞了 3 个比法国还要大的将近 15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英、法、俄、德、日等国还分别强行租借了广州湾、胶州湾、威海卫以及旅顺、大连。

通商口岸方面：1900 年前，帝国主义已强迫清政府开放了 45 个通商口岸，此后又开放了 37 个，共计 82 个。

租界方面 帝国主义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 16 个重要城市设立了租界 形成了“国中之国” 同时在北京还设立了使馆区，组成公使团，成了大清帝国之上的“太上皇” 直接控制和干涉中国内政。

同时，帝国主义还通过在工、矿、铁路等方面投资设厂以及政治贷款等，多方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其中 帝国主义在华投资设厂、开矿、修铁路等总额达 6—7 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近 3 倍。

刘望龄先生曾统计，1895—1912 年间帝国主义通过在华的大量投资，直接控制了机器开采煤矿的 91.9% 生铁生产的 100% 棉纱市场的 76.07% 铁路交通的 93.1%（1911 年）和内外航运吨位的 84.4%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商行到 20 世纪初年已达 2328 家 相当于 1895 年的 4 倍。

政治贷款方面：1900 年以前的 47 年间，清王朝向外国借款 66 次，总额 46 400 万两白银，而 1901 年后的 10 年间，清王朝向外国借款达 87 次 总额为 78 350 多万两，前后累计帝国主义的政治贷款高达 124 700 多万两。

大清王朝的经济已处于崩溃，据统计在 19 世纪末年，大清王朝每年外资的入超年均达 3—4 千万海关两；1901 年后 更是扶摇直上 每年入超达 1.2 亿海关两 最高年份达 2.19 亿海关两，是过去的 5—6

倍。

20 世纪初年，帝国主义通过推行“保全主义”，采用了政治、文化、经济等为主的所谓“温和手段”，在中国造成了“不劳兵而有人国”的局面。帝国主义在推行“和平”掠夺时，并没有放弃武装军事侵略。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军舰仍在中国的领海、江河、湖泊里横冲直闯；帝国主义的军队还驻扎在中国各大城市、战略要地，包括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城，直接威慑着大清王朝。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时地在局部地区进行武装侵略，1903—1904 年英军侵略西藏，攻占拉萨，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拉萨条约》，阴谋分裂西藏就是其中一例。法国企图侵占云南、广西，德国企图侵占鄱阳湖，都曾以武装的形式闯入这些地区。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划分了势力范围，其中沙俄将东北视为其势力范围，英国把长江流域作为其势力范围，德国占领胶洲湾把山东作为其势力范围，日本占领台湾把福建作为势力范围，法国直接将云南、广西视为势力范围，后起的美国则以所谓“门户开放”政策企图将整个中国对帝国主义开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还相互签订了各种协定的密约。这些协定的密约，绝大多数是以牺牲中国主权，企图宰割中国为罪恶标志。其中如：1902 年 1 月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1907 年的《日法协定》、《日俄

密约》、《英俄条约》等即是例证。特别恶劣的是：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期间，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地区，公然在大清帝国的境内发动战争。沙俄兵败后，沙皇俄国自己不赔一个卢布、不割一寸土地，竟无视大清帝国的主权，将其在南海所掠夺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作为了结。

“瓜分豆剖迫人来 同种沉沦剧可哀”“四万万
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等诗句正是这种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真实写照。

在这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大清帝国的社会危机也空前加剧，其中突出的一个标志就是 1901 年《辛丑条约》的订立。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外反动派之间的
主奴地位的完全确立。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已完全撤去了民族的界限，公然地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等作为其对外的基本方针的国策，它表明清朝统治者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

《辛丑条约》签订前后期间，西太后过得并不轻松，甚至有点胆战心惊。为了弥补自己的鲁莽，为了向远在北京占据着紫禁城的洋人献媚，西太后也尽其所能向西方列强作出姿态，其中除了明确宣布严惩义和团“拳匪”之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宣布“弃旧颁新”颁布所谓“新政”力图给洋人一点好

感。

1901 年 1 月 29 日 还没等度过农历新年 朝廷便迫不及待地颁布了“新政”上谕 上谕指出“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在上谕最后还加上了这样的话：“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舍此更无他策。”朝廷命令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 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事始兴，如何而人才如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如精”等问题详细议奏。

形式跟两年前一样，颁布者名处也还是光绪皇帝。

4 月 21 日，朝廷谕令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 派奕劻、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 刘坤一、张之洞等为参预。

督办政务处显然是个“大家庭”这里不仅有满清王公、几十年的洋务大臣、地方实力人物，也有在此之前从来未变过立场的顽固分子。

两年之前反对变法之人，两年之后再变两年之前未成的变法，这既无新鲜之感，又让人厌恶，中国人向来都不欣赏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人。况且，大清帝国的臣民都看得很清楚，朝廷并不是先清醒了再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而是洋人打了朝廷的嘴巴才清醒

的 这当然更可恶 大家都开始认识到《辛丑条约》的签订对大清王朝统治者意味着什么？

当然 朝廷的变革都必须经过太后的谕旨 这时太后和皇上还在西安，西太后确实还不敢立即回宫，洋人是否还保留对她的处置权也未可知。对于洋人草拟的《辛丑条约》诸款，她几乎没顾得上细看就批准了。按照条约规定，清朝需派一亲王赴德国以谢公使克林德被杀之罪，派一亲贵赴日本以谢书记官杉山彬被杀之罪，慈禧也都一一照办了。

洋人又提出在诸国人民被戕害凌虐之各城镇，5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要“朝廷永禁军民人等仇视诸国会，违者问死”，这些要求显然是在斩断朝廷的根，但是太后只好答应。

此时太后不再顾及正统与体面，一心指望着李鸿章在北京给他疏通洋人，搞好关系，好早日回宫。

庚子与辛丑之交是一个如此深刻的转折点，西太后思想的变化也是如此的剧烈！

1902年2月3日的（泰晤士报）报道了前此两天慈禧太后接见各国驻京公使的情况：“太后进屋一把抓住康格夫人（美国公使夫人）的手，好几分钟没有放开，她浑身颤抖，抽泣哽咽地说进攻使馆是极大的错误 她后悔莫及。”后悔莫及 像是一种反思。不久 太后终于喊出了“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大清帝国绝对的一国之主，竟成了洋人的“奴

才”大清帝国不仅开始丧威而且已完全失志了。

既结与洋人之“欢心”就必失于国计民生。为了支付巨额赔款，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加紧对全国人民的经济榨取，其中如庚子赔款 45 000 万两白银，连同利息高达 98 000 万两，清政府全部转嫁到人民头上，规定各省每年“摊派赔款”2 000 多万两。此时全国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不仅有原先的粮、盐、茶、糖、鸦片、印花等税，还一加再加，如新增赔地捐、地捐、随粮捐、房捐、新票捐、坐贾捐、糖酒油房捐、铺捐、纸捐、果捐、肉捐、煤捐等种种名目，各种杂税“省省不同、府府不同、县县不同，名目下数百种”，甚至连瞎子、娼妓、订婚以及农民挑担大粪等也得交税。“自古未闻屎上税，如今只有屁无捐”，正反映了这方面的实际情况。

对此，连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

业之至秽至贱者灰粪有捐，物之至纤至微者柴炭酱醋有捐，下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田亩所产之物，如米豆蔬瓜果无不有捐。

正是在此残酷勒索下，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增再增。19 世纪末，清政府年财政收均在 4 000 万两，1903 年增至 10 000 万两，此后不到 10 年便达 3 亿两，短短的 10 年人民负担增加了 7—8 倍。人民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

●新的力量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中国，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渐已形成。

事实上，自 19 世纪 40 年代大清帝国被迫开埠通商之后，中国社会即已处于变动的暗流之中，这种变化是朝廷无法控制的，当然朝廷也始终没有精力去注意这种变动。这种变动终于导致了新的经济和新的力量出现，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它们的发生、发展至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 世纪的 60—90 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形成的初期阶段。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 1894 年中日战争前，全国有资本可查的新式资本主义企业约 72 家 资本总额约 2 100 万元。其中商办企业 53 家 资本总额 470 万元；官办、官督商办的 14 家，资本总额 1620 万元。在这中间，商办企业仅占投资总额的 22.4%。这些企业的投资者多是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尽管这些企业在当时占整个中国经济的比重份额有限，而且这些企业和企业主当时也并不能控制大清帝国的国民经济命脉，但这些企业已逐步形

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and 新的社会阶层却是毋庸置疑的。也许这批新的阶层中的许多人只做没想或者是多做少想，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经逐步超出了封建统治者规定的范围。

从 1895 年到 1912 年前后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其中特别是 1905 年到 1912 年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显著增长。据不完全统计：1895—1913 年全国新设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厂矿共 549 家，资本总额 12 000 万元。其中，商办企业获得极大发展，共达 463 家 资本总额为 9 100 万元 与第一阶段相比 投资额的比例由 22.4% 增长到 76.3%。商办企业跃居优先地位，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失去过去的绝对优势。

此外，在工业门类的分布上，商办企业也由原先几乎全部是轻工业而逐步向重工业发展，其中特别是铁路、运输、航运、银行、采矿、冶炼以及金属加工等，都占有相当的比重。这就表明中国民族资本的经济力量已经发展，其作为一支独立的新的社会力量已不容忽视。

数字的统计是枯燥的，但它很能说明问题。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中国的资本主义力量已逐步形成，中国老百姓已经能从日常的衣食住行感受到这些。以衣而言 所谓的“洋布”包括国内民族资本和

外国资本生产的机器织布已进入中国城乡，至少在东南沿海一带其优势明显超过了土布，被士农工商各阶层人们广泛接受。以食为例，所谓的“洋面”“洋米”，即包括国内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生产的用以碾米、机面、榨油的机器被人们广泛采用、接受。在行的方面，如轮船、火车等不仅明显地优于传统的马车、帆船，极大地缩短了人们的距离，而且促进人们观念上的改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士为首商为末的观念，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而终于开始变化。无独有偶，晚清的江苏南北两大状元，即苏州的陆润庠和南通的张謇皆在 1894 年的中日战争后开始了投资新式工业的活动，分别投资创办了苏州的苏纶纱厂和南通的大生纱厂，对晚清士大夫官绅投资实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批批的新式企业家及其思想家大声疾呼：“上古之强在牧，中古之强在农，近世之强在商”；“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吾辈商人肩其责”。这些新式企业家及其思想家们早已把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倒置，俨然以“商”为首自居，“言其功效，比隆禹稷，岂过也哉？”这种较为深层次的观念的改变，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力量的增长，已不容人们所忽视。

与这种新的经济力量相呼应的主张改革的新思想也应运而生。其中人们常把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主张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视为中国近

代改革思想的先驱，把王韬、冯桂芳、郑观应等人主张的全面的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视为进一步的发展，而把康有为等人作为变法维新的代表，即主张不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且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并用于改造中国现存的大清帝国的制度。

应该说，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 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形势迫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苦闷中思索，并在失败中寻求崛起，从而也终于在甲午战争后形成了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拯救中国不同方式 即 康有为、张謇、孙中山等人分别代表的三种方式和三种社会力量。

其一是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奔走呼号，吁请朝廷变法，自公车上书直到百日维新失败被迫流亡海外 仍呼号不已 可谓痴心不改。

其二是以张謇等人为代表，主张实业救国。他以晚清状元的身份投资实业，终于完成了从封建士大夫到实业资本家的转化，高举实业救国的大旗，积极地投身实业；而在政治上则谨慎地关注着变法和立宪，他们与康有为等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孙中山等人作为革命派的代表，高举反清革命的大旗 也正是在 1894 年 甲午年间 年底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明确地提出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的纲领，成为革命的先驱者。

历史在甲午战争后给先进的中国人以广阔的探索空间，康有为、张謇、孙中山等各类代表人物都为实现各自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当然，这里我们不应回避的是：1902年后清廷所实行的所谓“新政”，对中国这种新的力量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应该说，清廷此时开始的所谓“新政”既是清廷统治者挽救垂危统治，力图缓和阶级矛盾、平息革命的手段，但同时，它又在无形中确认了这种新的力量为正统，并在客观上给了新的经济以某种促进作用。

在清廷新政的改革中，清廷颁布了一系列章程、法令，诸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科举、办学校以及准许满汉通婚、劝止缠足等，尽管其中不少方面内容是形同虚设的一纸空文，但也有不少内容，如“奖励实业、兴游学、兴学校”等措施，客观上对新的力量的发展起了催化作用。

以奖励实业方面为例。1903年9月，清廷谕令成立商部，1904年11月公布《商律》9条，《公司律》130条，《商会章程》26条；并首先在京师成立商会；1905年1月25日，在商部成立商标注册总局，颁布

(《商标注册试办章程》 28 条 并陆续公布《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开矿暂行章程》、《奖励公司章程》、《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

短短的两年，朝廷一下子颁布了如此众多的经济新政策、新法规，似乎它已全然不顾自己封建朝廷的身份，全然不顾戊戌变法时它曾用维新志士的鲜血涂抹掉维新措施影响的事实。

然而就像当年维新派倡言“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是基于工商实业在甲午以后确有发展的事实一样，朝廷现在制定的各项措施也是不得不承认不断高涨发展的工商实业的要求。而这种承认与其说是尊重事实，倒不如说是屈服于事实。朝廷在屈服的同时，不得不放弃千百年来的“重农抑商”政策，而重农则是一个封建朝廷依赖的基础。

其实，工商实业是民族资本一直呼吁发展的重要内容，它也是洋务运动的内容之一。朝廷一直以官督压制着商办，李鸿章与张之洞一直在为朝廷把握着工商实业政策，他们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政绩一方面在洋人面前使朝廷能挺直一下腰杆，另一方面又不悖于朝廷的正统，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主张让慈禧太后和朝廷都很放心的。甲午战败以后，朝廷不得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设厂办企业，一些中国人也提出了自办工厂的要求，而且这些要求是直接针对洋人的办厂势头，他们提出了以“商战”抵“兵

战”的口号，朝廷不得不在对允许商人自办工厂的控制上作出一些让步。20 世纪初“实业救国”已成为一种气候。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1894 年甲午年间的恩科状元张謇的前后变化。

张謇 1853 年出身于江苏通州一个普通寒门农家，从 16 岁考中秀才后，张謇前后花了 25 年左右的时间奋进科场，历经落第之难，终于摘得状元桂冠。但就是这位饱受封建功名礼教“洗礼”的大清官绅在甲午战败的冲击下，毅然辞官回到通州，义无反顾地创办大生纱厂，那年张謇已经 43 岁。过了不惑之年的张謇一下子抛弃了自己前半生为之奋斗的一切。张謇没有像孙中山那样完全转变到了反清革命的立场上，张謇没有反朝廷，但是反对朝廷的政策。张謇从大办实业开始，真正走上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

从 1895 年到 1907 年张謇的业绩是惊人的。1899 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原始资本 445 000 两，纱锭 20 400 枚。1904 年，张謇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和续招新股，增加资本 63 万两，增添纱锭 20 400 枚。1907 年又建成大生二厂，遂发展成为拥有资本 200 万两和纱锭 67 000 枚的大厂，是“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

为了发展生产，使大生在通州地区能自成系统，

张謇又陆续开办了一批企业：1900 年兴办了通海垦牧公司，1902 年办了广生榨油公司、大兴面粉厂，1904 年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船公司和天生港轮船公司，1906 年创办天生冶铁厂，此外还创办了吕四盐业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吕四渔业公司、大隆肥皂厂、阜生蚕桑公司、颐生酿酒公司、泽生水利公司、达通航业转运公司、大中通运公司、复兴面粉公司和翰墨林印书馆等。张謇参加投资的企业有：上海大生轮船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厂、镇江螺丝山铅笔公司、吴淞江浙渔业公司、海州赣丰饼油公司、宿迁耀余玻璃厂、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苏省铁路公司和中国图书公司等。大生集团投资于各企业的资本总额达到 900 万元。

如此巨大的产业规模都是在 1895 年后 10 年左右时间里创造的，而在这 10 年中朝廷经历了维新变法、庚子变乱，其间风云变幻，张謇的大生企业在动荡的夹缝之中依然保持着发展。张謇没有同意康有为激进的变法主张。当 1898 年康有为在上海组织强学会时，张謇谢绝了康、梁对他的电报邀请，没有加入强学会，对后来慈禧太后断然与洋人对抗采取“灭洋”政策时，张謇是倾向于东南互保的，他从发展实业角度出发，竭力与张之洞、刘坤一等多一道依靠洋人势力，维护了江浙长江中下流域的稳定。1901 年朝廷“新政”诏书颁布后，张謇从内心里欢呼。不久，朝

廷对他兴办实业的业绩进行了嘉奖，张謇对朝廷的热情重又燃起。对比 1895 年张謇对朝廷失去信心辞官回籍到后来张謇积极投入朝廷的“新政”显然张謇经历了从状元到实业家的变化，同时，朝廷也已从一个顽固自大的封建王朝变成了不由自主的“洋人的朝廷”。其实张謇的热情真正在于资本主义的倾向，朝廷的让步则又是迫于这种倾向的压力。

清廷“新政”中关于编练新军的内容可以说也给了袁世凯崛起提供了又一次机会。

编练“新军”最为积极的是袁世凯。袁世凯一直是个“乖巧”人物，戊戌政变中他出卖维新派倒向慈禧太后；义和团兴起，他坚决剿杀义和团讨好洋人。1901 年 11 月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仗着洋人的支持打通关系，由奕劻保荐出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立即奏准在直隶编练“北洋常备军”。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袁世凯很快招来了当年“小站”练兵时的老部下，袁世凯是最善于经营自己的势力体系的。1902 年夏他即练成一镇约 12 500 名。到 1904 年春即练成“北洋常备军”三镇。1905 年编练“北洋陆军”六镇。袁世凯以他新的北洋势力为资本而取代了李鸿章成为 1901 年以后朝廷权重一时的人物。

庚子以后，朝廷重用袁世凯已不如当年起用李鸿章那么慎重了，对朝廷来说，用袁世凯是看重了袁

与洋人的关系和机灵，对于其为人如何显然已无暇顾及。袁世凯也确实不同于李鸿章。

在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的同时，1902年11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也练成“常备军”约7000人。

显然，这时朝廷的练兵有点“急于求成”。1903年12月4日朝廷设立练兵处，任命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其练兵处的总提调徐世昌、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副使冯国璋、军政司正使刘永庆等，都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时所建新建陆军的嫡系，因此，实际上兵权则始终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各省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1904年9月，兵部奏准在全国编练“新军”并颁布《陆军学堂办法》，拟编成36镇。

袁世凯不但通过编练新军首先编练成北洋六镇，而且还先后建立了保定行营将弁学堂、陆军小学堂、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军官学堂、讲武堂的学兵营。同时，他还设立了军医、马医、经理、军械、电讯学堂，以培养专门军事人才。他还仿照外国之法创设巡警，设立了警务总局和巡警学堂。

可以说，清廷“新政”的“编练新军”等内容给了袁世凯等人发展自己，扩大势力的机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里，袁世凯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迅速膨胀，终于成为晚清地方势力最大的一个集团，由此奠定